

人性的断裂

NA LAI ZHU YI
CONG SHU

〔英〕休 谟 著
冯 援 译

拿来主义丛书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3 6506 6

拿来主义丛书——

人性的断裂

〔英〕休 谟 著
冯 援 译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性的断裂/(英)休谟著;冯援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9
(拿来主义丛书)
ISBN 7-80091-905-6

I. 人… II. ①休… ②冯… III. ①人性-研究 ②休谟,
D. (1711~1776)-哲学-著作 IV. B561.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17028 号

拿来主义丛书

人性的断裂

原 著:〔英〕休谟

翻 译:冯 援

出版发行:光明日报出版社

社 址:北京宣武区永安路 106 号

邮政编码:100050

电 话:63017788-225

印 刷:北京市朝阳区科普印刷厂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字 数:156(千)

印 张:7.375

印 数:1 12 000 册

版 次:1996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1996 年 9 月第 1 次

ISBN 7-80091-905-6/Z·41

定 价:9.40 元

光明日报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前 言

什么是人性？泛而言之，一切人类的思想和行为的根本动因，就是人性的主要构成成分。人性的萌芽状态，寓存于心的朦胧幽暗的一隅；当它在社会群体生活中，逐步趋向明朗，由此产生了人的意识和团体的意识、民族的意识、国家的意识。它一边在创造文化，一边又接受文化的熏陶，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和完善了人之为人的那一切情愫，并通过这种努力，将人与生物界的其他族类区别开来。人们在共同生活中，由于意识的引导，产生了欲望和恐惧，对利益的追求和对危险的规避，产生了荣誉感和羞耻感，恨与爱，偏狭与宽容，刻毒与慈善；傲慢与谦逊，残暴与温柔。这一切纠缠在一起，而又此消彼长，错落有致，幻成人生炫目的七彩光环。人生之值得留恋，也许正在于这些令人振奋又令人哀伤、令人痛恨又令人眷恋、令人欣慰又令人无奈的生命之河的交汇中罢？如果没有这一切，我不能设想，人生还能是壮阔的和美丽的。

一切生命之歌都起源于人性。麋鹿的求偶，鸟儿的鸣唱，游鱼的恬然自乐，花儿的春华秋实，这些我们都可以解释为生物的本能，甚至，只是它们自身无法控制、无法调节的生长——死亡的过程。它们是无意识的，或者说，只有极微弱的意识，尚不足以据此支配思想，形成概念，改革环境，创造未来。在这个星球上，唯有的是具有智慧的，因而能够在产生智慧之初，首先产生了酝酿并保存智慧的工具，这就是人性。

探讨人性是一件有意义的哲学工作。对这个问题，古今中外的许多贤哲都曾付出过大量的心血，作过大量的细致入微的考察，因而也留下了大量的经验、心得、教训和推测。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广

袤的、深得难以测度的世界，完整而充分地揭示其中的奥妙，目前还不能令人满意的做到；因为人性固然有其恒定的一面，但也有其变幻不居的一面。但是，在众多的探讨人性的哲学著作中，英国哲学家休谟的《人性的断裂》，可算得上是较为成功的一部。

戴维·休谟(1711—1776)，苏格兰人，出生于没落地主家庭，曾就读于爱丁堡大学；18世纪西方哲学中代表人物之一，近代不可知理论的奠基人，同时又是一位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

休谟继承了贝克莱(1684—1753)的唯心论体系，并把它发展为不可知论。他把人的一切认识，统归纳为知觉，而知觉又分为印象和观念。印象是当时的新鲜活泼的感觉，观念则是过后对于印象的模糊的临摹；一切观念都是原始印象的不同方式的组合。他怀疑感觉之外的任何存在，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漠然无视，否定事物间的因果关系、转化趋势及必要条件，把人的认识局限在主观经验的范畴之内。在他的一些著作中，他曾公然的宣称：“自私和人性不可分离”，把人性解释为追求财富、权力、享受，以及对贫困和卑贱的厌憎和逃避。他的哲学思想对近代西方资产阶级哲学发展影响深远，开康德“不可知论”和其他各种主观主义、唯心主义哲学流派的先河。他的代表作品除《人性的断裂》外，尚有《自然宗教对话录》、《政治论》和《英国史》等等。

在《人性的断裂》中，休谟较为系统的论述了人性的起源、发展、作用与限制，运用较为通俗易懂的哲学语言，阐述了一位哲学家对世界、对人类的坦率的想法。在这里，他撇开一切成见和定论，另辟蹊径，在对众多的生活现象的观察上、对大量历史事件的研究上，运用高超的思维力量，努力建立起自己的主观主义唯心论哲学的大厦，使人类对于自我的认识，有了一个新的开端和高度。

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的世界里，但精神的饥渴，总逼使我们寻求荒漠中的甘泉。在体验了过多的浮躁与张狂之后，人类会感觉到心的空旷和灵魂的疼痛。哲学，正是产生于对生命现象的周密的思

考之中。它剖析了那些属于“灵性”那一面中的许多迷阵，解释并抽象了形态各异的疑虑、苦恼、困惑和彷徨，使人类对世界、对自己的认识，一步步达到更高的境界中去。哲学家是人类的思想者、人类的占卜者和人类的体温计，一个健全的社会，应该在尽情的寻欢作乐之余，免费供养几位以思考为终身职业的哲学家，因为，他们常常会提前预告人类的福音或丧音。“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其声大而远”，为的正是振聋发聩，使大多数人从碌碌红尘中猛然惊醒，吐出一口浊气；吸进几缕经过高温高压杀菌处理过的哲学的空气。

当然，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有他的不足，哲学也远没有完善到白璧无瑕的地步，它不但有许多未知的领域需要探索，并且，即使在它早已涉足的领域内，也依然留下大片空白，或虽有文字但有朝一日必将被历史的潮汐涂去的篇幅；而这正是我们寄希望于未来的哲学家奋发努力的地方。休谟的《人性的断裂》，在历史上自有其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但 220 余年后的今天，重读这部关于人性的论著，我们明确的感到，它是不完善的。不仅他的哲学思想基础是脆弱的，而且，即使在行文上，也仍然有疏于推敲的地方。他所探讨的问题，以我们今天的眼光看，难免会有不赞成、不满足、值得商榷的地方，但哲学家的那种富于思辨的、明澈的思想，和勇于探索的勤奋，必会给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我们在这里推出这部著作，相信会受到大多数心有灵犀的读者的赞赏和欢迎的。

默 子

一九九六年七月二日于北京

休谟自传

一个人在叙写自己的生平时，如果说得太多，总不免有追求虚荣之嫌，所以我的自传要力求简洁。如果人们认为我擅自叙写自己的生平，那正表明一种虚荣；但幸而这篇叙述文字所包含的，除了有关我自己著作的记载而外，很少有别的内容；而且我的一生也差不多是全消耗在文字生涯中的。另外，我的一些著作的初步成功，也并不是成为虚荣的资本。

我于1711年旧历4月26日在爱丁堡出生。我的家世不论从父系方面或从母系方面说都是名门贵胄。我的父亲是何谟伯爵、或休谟伯爵家族的一支；至于我的祖先，则历代以来，曾经领有过我兄弟们所领有的那些土地和产业。我的母亲是法尔康诺爵士的女儿（法尔康诺是民事最高法院的院长），她的兄弟世袭了赫尔克顿勋爵的贵族称号。

不过我的家境并不富裕。而且由于我在兄弟排行中最小，所以按照乡下的旧俗，我的遗产是微乎其微的。我父亲算是一个有天才的人，当我还是婴孩时，他就死了；留下我和一个长兄，一个姐姐，让母亲来照管我们。我母亲是一位品行端正善良贤慧的女人，她虽然年轻，而且容貌较好，可她在丈夫死后，仍能俭朴持家，尽全力于教养子女。我受过一个时期的普通的教育，成绩较为理想。在很早的时候，我就一心迷上了文学创作，象堕入情网似的头脑发昏；这种热情是我一生中的主要情感，而且是我取之不竭的快乐源泉。因为我的好学、持重而勤勉，所以大家都认为，法律才是我的合适的行业。不过，除了哲学和一般学问的钻研而外，我对任何东西都感

到一种不可抑制的嫌恶：因此，当他们以为我正在钻研怀特（Voet）和维尼乌斯（Vinnius）的时候，我实际上却在暗中贪婪的阅读西塞罗（Cicero）和维吉尔（Virgil）诸位作家。

独立以后，我的微薄的一点家产实在不能应付这种生活的安排，而且我由于勤勉用功之故，健康受到极大的损害，变得弱不禁风，因而我就有意（或者说被迫）来试试身手，以求进入一个较为宽裕的生活圈子中。在1734年，我曾带着别人给我的几封信，到普鲁士去找几位有名的商人。然而几个月后，我就觉得那种生活完全不合我的胃口。于是我到了法兰西，打算在乡下隐居，专事研读。在那里，我奠定了我一生的大计，并向着我那个大计一直不懈地追求下去，结果也算是符了所望。我那时处处力求节省，以弥补资产的不足，使其能勉强维持我的独立生活。除了在文学中培养我的才能，我不无偏激地认为，其他一切事物都是智能低下的表现，是不值一顾的。

在我隐居法国时（最初在罗姆，不过大部分时间却在安如郡的拉福来舍），我开始撰写我的《人性论》（*Treatise of Human Nature*）。在法国舒适地过了3年之后，我于1737年返回伦敦，在1739年末，《人性论》初版付梓，我终于得暇去看望我的母亲和兄长。我的这位长兄住在乡下故居，精明地经营着那片古老的庄园，家产日有所增，我认为他颇为成功。

任何一个人的以文谋生的企图，都不及我的《人性论》那样不幸。它从机器中一生出来就死了，它无声无息，甚至在狂热分子中也不曾激起哪怕一句牢骚来。不过我的天性原是愉快的、乐观的，所以受了打击之后，不久我就恢复了常态，而且继续在乡间热烈地从事研读。1742年，我在爱丁堡印行了我的《论说》的第一部分。这部著作颇受人欢迎，所以不久我就完全忘了从前的那场挫折。我和我的母亲及长兄继续呆在乡间，并且在那段闲适的日子里，重新温习在我幼年时过分忽略了希腊文。

1745年，我接到阿南戴尔侯爵的一封信，请我到英格兰和他住在一起。后来我知道，那位青年贵族的朋友和家属，都愿意让他受我的照顾和指导，因为他的心理状态和健康情况都要求必须如此去做。我和他在一起待了12个月。那个时期中的这项工作报酬丰厚，使我的少量的资产有了很大的增益。此后我又受圣克莱尔将军的邀请，并给他的远征团当秘书。那个远征团本来打算去加拿大，但结果却侵入了法国的海岸。又一年(1747)，那位将军到维也纳和杜林的宫廷去做军事使节，他邀请我与他同去，仍然做秘书。我于是穿上武官的制服，以副官资格被介绍到那些宫廷里；和我同去的有埃尔斯金爵士和陆军大尉格兰特——即现在的格兰特将军。我一生中只在这两年间中断了我的读书生活。回想那时日子过得可真舒服，而且往来的也都是些上流人物。我因为有这么个官职，并且力事节省，所以就慢慢积累到在我认为是可以独立为生的一份资产——虽然我在这样说时，我的大多数朋友们多爱笑我。总而言之，我在当时差不多拥有了1000英镑。

我一向总认为，我的《人性论》的第一版之所以遭到失败，多半是由于叙述的不当，而不完全是由于意见的不妥；而且我之仓促付印，乃是一件最鲁莽的事。因此，我就把那部书的第一部分重新改写，写出《人性的断裂》来。这部新书是我在杜林时出版的。不过这部书在一开始，比《人性论》也并不怎么成功。在我从意大利回来以后，我看到全英国都对米德列顿博士(Dr. Middleron)的《自由研究》(Free Enquiry)狂热地倾倒，而我的作品却完全被人忽略了。这使我大为丧气。我早先在伦敦所印的那些道德的和政治的论文，到此时我又重新印出来，不过也并不受人欢迎。我的乐观天性的中和力量冲淡了这些失意，使这些失意事对我几乎不留什么痕迹。1749年我回到老家去，和我的长兄在他的乡舍中住了两年，因为我的母亲在此时已经去世了。我在那里写了我的《论说》的第二部分，给它起名为《政治论》(Political Didcourses)；此外又写了《道德

原则研究》(Inquiry concerning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这是我重新改写过的《人性论》的另一部分。这时候,我的书商米拉耳通知我,我先前的出版物(除了那个不幸的《人性论》)已经逐渐成为谈论的资料;销行的数目也逐渐多起来,而且社会还要求再版。牧师们和主教们的答复一年中有了二三次,而且我根据渥尔伯顿(Dr. Warburton)的嘲骂,看到那几本书在有脸面的人们中间也逐渐被重视起来。但是我曾下了决心,不答复任何人,而且我这种决心也算是维持到底了。我的脾气既不易发怒,所以我就容易摆脱一切文字的争论。这些可以表示我声誉鹊起的征候,大大鼓舞了我的兴头,因为我一向看事物总爱看乐观的一面,而不爱看悲观的一面。我想一个人有了这种心境,比生在每年有万镑收入的人家里,还要幸福得多。

1751年我从乡下搬到城市——那才是文人的真正舞台。1752年,我曾一度住在爱丁堡,在那里将我的《政治论》脱稿付梓。在我的作品中,只有这一种是在出版之初就获得成功的;它在国内和国外,都受到欢迎。同年又在伦敦印行了《道德原则研究》,这部书在我看来(我自然是不该自行判断的),是我的一切著作(不论历史的、哲学的、文学的)中最具有价值的,有着无可替代的位置。但它出版以后,却没人注意,没人理会。

1752年,苏格兰辩护士协会(Faculty of Advocates)选我为他们的图书馆员,这个职务给我的薪俸很少,不过它却使我可以任意利用一个大图书馆。于是我就拟了一个计划,准备写一部《英国史》。不过,要连续叙述一个民族的长达1,700年的历史,想起来就令人害怕,所以我就截取段落,从斯屠渥特家的那位起首;我认为在那个时期,政党的播弄是非,颠倒黑白,才初次出现了。我承认,我当时对于此书的成功,颇有点踌躇满志。我曾想,历史家而能把现世的权力、利益和权威,及一般的成见都弃而不顾的,只有我一人;而且历史这个题材既然适合于任何才干,所以我也期望得到相

当的赞赏。不过我受到的挫折却也太令人可怜。人们都攻击我，向我发出责斥，非难甚至厌恶的咆哮。英格兰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民权党、王党、教会中人、各派中人、自由思想者、宗教家、爱国者、宫廷中人，都一致怒火中烧，因为我胆敢擅自对查理一世和斯特洛浦伯爵的命运，洒一掬同情之泪。当他们的怒潮的狂澜过去以后，更令人丧气的，乃是那部书似乎已被世人置之度外了。米拉尔先生告诉我说，在一年之内，《英国史》在他手上只卖了45本。在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我实在也不曾听说有一个显贵或文豪能容忍我的这本书。不过英格兰大主教海林博士和爱尔兰大主教斯顿博士却似乎是两个凤毛麟角的例外。这两位主教曾经分别传言给我，嘱我不要气馁。

然而我不得不说，我终究气馁了。当时若不是因为法国和英国发生战争，我肯定会退休到法国的几个省市去，更名改姓，再不回到我的故乡。不过这个计划在当时就有点不切实际，而且以后的卷帙也有了些转机，所以我又决心鼓起勇气，努力奋进。

这一时期，我还在伦敦印行了我的《宗教的自然史》(Natural History of Religion)以及别的一些小书。它虽发表于世，却如泥牛入海，只有虎尔德博士(Dr Hurd)写了一个短册来攻击它，他的小册子富有渥尔伯顿学派(Warburtonian School)所特有的特征：偏狭、急躁、粗暴、漫骂。这个小册子颇有几分安慰了我的著作在其他方面所受的冷淡待遇。

1756年，在第一册出版两年之后，我的《英国史》的第二册又出版了，这一册包括了从查理一世之死到革命时期的那一段。这次作品却意外的没有引起民权党人那样的不快来，而且也比前一册较受人欢迎。它不仅把它自己地位提高了，而且间接地使它不幸的李生兄弟也跟着抬起头来。

不过我虽然凭经验知道，民权党有权力在政治和文字方面赏赐一切位置，可我仍然不愿意屈服于他们那种无意义的喧嚷，所以

我在前两个斯屠渥特朝代方面，虽由于继续研读和沉思的结果，使我改动了百余处，可我所改动的地方，总是偏向着王党一面的。真的，要认为那时以前的英国宪法是一个拥护自由的正式方案，那是很可笑的。

1759年我印行了我的屠陶家(Tudor)的历史。人们对这部书所喷射的喧声，差不多等于对前两个斯屠渥特历史所表示的总和。伊丽莎白王朝的历史是特别令人生厌的。不过我这时对于一般庸人的意见，是处之泰然的，因而我仍在爱丁堡的隐遁处恬然自足地完成《英国史》的较早的一部分。书共两卷，我在1761年把它出版，所得到的只有一点勉强说得过去的成功。

虽然我的著作遭受了狂风暴雨，可它们仍然进行得很顺利，因而书商所给我的版税竟大大超过了英国向来一成不变的所有的版税。因此，我不只实现了经济的独立，而且有了富余。我于是退休到苏格兰故乡，决意不再出世；那时因为自己不曾拜谒过一个伟人，甚至于不曾邀好于任何权贵，所以自己颇为自得，并愿借隐居把这种自得之乐维持下去。现在我既然已是知天命之年的人，所以很自然的打算只在这种哲学的生涯中度过自己的余生。不想1763年时，我却接到素昧生平的海尔浦(Herford)伯爵的邀请，让我陪他到巴黎赴任大使，而且他允诺我不久就可以被任命为使馆秘书；同时，我实际上执行的也是秘书之职。这个建议虽然富有引诱力，我在起初却辞谢了；一则因为我不乐意和权贵打交道，二则因为我恐怕巴黎的礼让文雅、繁华侈丽的社会，也不宜于象我这样年纪和性格的人。其后由于那位伯爵的再度敦请，我也就接受了他的提议。就快乐讲，就利益讲，我和这位贵族相处，可算是一件幸福的事。就是后来和他的兄弟康威将军(General Conway)相处，也是很幸福的。

人们如果没有领教过风尚的奇特之力，那他们永远想象不到，我在巴黎从各种阶级、各种地位的男男女女那里，受到了什么款

待。我愈回避他们那过度的礼让谦恭，他们愈对我表示礼让谦恭。不过在巴黎住，也能得到一种真正的满意，因为那座城市里富有聪明、睿智而文雅之士，那是全世界任何地方所不及的。我有一度打算终身定居在那里。

我从那时起就被任命为使馆秘书。1765年夏天，海尔浦伯爵离开了我，因为他要去爱尔兰接任总督，这样我做了代理公使，直到雷池门(Richmond)公爵于那一年年底来巴黎到任以后才罢。1766年初，我离开巴黎，夏天到了爱丁堡，我去那里的意思仍和先前一样，打算让自己隐居在一个哲学的世外桃源里。我返回那个地方时，比我离开它的时候，虽不能说是更为豪华了，可是因为海尔浦的友谊，我却有了较多的钱，较大的进款；那时我正打算试试，多余的家资会发展成什么事业，一如我在先前试验我的小康时那样。但在1767年，我又接到康威先生的邀请，让我做次官去。因为那位先生的人格和我同海尔浦伯爵的关系，使我不能辞谢这番盛意邀请。当我再度返回爱丁堡时，已是一个小小的富翁（因为我每年有1,000镑的收入），身体颇健，虽然年迈，还有希望久享清福，并看着自己声名日起。

1775年春天，我患了肠胃病，这病在一开初并不曾使我惊恐，不过我想它有可能演变成致命的、无法治疗的病症。现在我料想死亡是很快的了。我倒没有因为我的疾病受到什么痛苦；更奇怪的是，我的身体虽然很衰弱，可我的精神却没有一刻消沉。因此，假若我要指出我一生中哪一个时期是我最愿意重新过一次的话，我一定会挑出这后一个时期来。我的研读仍如以前那么热烈，我的谈笑仍如以前那么快活。而且我想，一个人已经到了65岁，就是死了，也只是截去不多几年的沉溺病榻的光景，没有什么值得惋惜的。而且我虽然看到，有许多征候预示我的文名终究会显耀起来，可是我知道我也只有不多的几年来享受它了。到此时，我对于生命算是最无牵挂的了。

现在我可以回顾一下我的性格,并结束此文。我的为人,或者宁可说,我从前的为人(因为我现在说到自己时,应该用这种过去时态;这样一来,倒使我鼓起勇气,来吐露自己的意见),和平而能自制,坦白而又和蔼,愉快而善与人亲昵,最不易发生仇恨,而且一切感情都是十分中和的。我虽是最爱文名,可是这种得势的情感也并不曾使我辛酸,虽然我也遭遇过几度挫折。青年人和不自检束的人也乐于与我相处,正如勤恳的人和致力文艺的人乐于与我相处一样。我因为与谦贞有仪的女子相处,觉得特别愉快,所以她们待我也很好,没有什么使我觉得不满意的地方。总而言之,许多人虽然在别的方面都卓有建树,可是也往往遇到人的诽谤,致使自己不悦。至于我,则不曾被诽谤的毒齿啮嚼和伤害。我虽然置身于各政党和各教派的狂怒之下,可是因为我对他们平素的仇怨处之泰然,他们反倒似乎失掉了武器。我的朋友们从来没有遇见任何机会,来给我的品格和行为的某些地方辩护。狂热的信徒们并非不愿意捏造并传播不利于我的故事,但他们从来找不出令人可以有几分相信的事实来。我并不是说,我自己所写的这篇安葬演说式的文字中没有任何虚荣心在内,不过我希望,我的这种虚荣心并没有放错了地方。这是一件容易弄明、也容易核查的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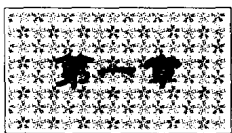
休 谟

1776年4月18日

目 录

前 言	默 子 I
休谟自传	休 谟 I
第一章 哲学的分野	1
第二章 观念的起源	13
第三章 观念的联络	20
第四章 对理解作用的一点质疑	22
第一节	22
第二节	29
第五章 关于怀疑的一种怀疑主义解法	38
第一节	38
第二节	46
第六章 必然性	56
第七章 “必然联系”的观念	60
第一节	60
第二节	74
第八章 自由和必然	81
第一节	81
第二节	97
第九章 动物的理性	105
第十章 神迹	110
第一节	110
第二节	117

第十一章	特殊的天意和来世的状况·····	133
第十二章	怀疑哲学·····	150
第一节	·····	150
第二节	·····	156
第三节	·····	162
第十三章	论爱与恨的对象和原因·····	167
第十四章	论慈善与愤怒·····	171
第十五章	论怜悯·····	174
第十六章	论恶意与妒忌·····	178
第十七章	论慈善与愤怒和怜悯与恶意的混杂·····	188
第十八章	论尊敬和鄙视·····	197
第十九章	论性爱或两性间的爱·····	202
第二十章	论许诺的约束力·····	205
第二十一章	论仁善与慈善·····	215



哲学的分野

精神哲学 (Moral Philosophy) 或者说人性科学, 可以从两种途径来加以研究。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各有其特殊的优点, 都可以给人类带来快乐、教训或知识。第一种研究方法把人看作在大体上是生而来行动的, 而且在他的行为中是为兴致和情趣所左右的: 他追求这一个物象, 而避免另一个物象, 其或趋或避, 是按照这些物象似乎所含有的价值为准则, 是以他观察这些物象时所采取的观点为标准的。人们既然认为, 德性是一切对象中最有价值的一种, 所以这一派哲学家就把德性描写得最为和蔼可亲。他们从诗和雄辩术中借来一切手段, 而在讨论他们的题目时, 又总是采用一种轻松简易的方法, 尤其乐于采用一种最能取悦想像, 引动情感的方式。他们从日常生活中选择出最动人的观察和例证来, 把相反的性格罗列起来加以适当的对比, 他们以光荣和幸福的前程, 来引诱我们进入德性之途; 并且用最健全的教条和最显赫的范例, 在这些途径中驯服我们的步伐。他们使我们感觉到恶和善的差别; 他们刺激我们的情趣, 并加以规范, 因此, 如果他们能使我们象乳牛似的听话, 并全身心的爱好诚实的行为和真正的光荣, 那他们就认为已经充分达到他们著书立说的目的了。